

「毛澤東思想萬歲」

第四輯

目

录

1. 毛主席一九六五年于杭州的讲话 ----- (1)
2. 中央关于加强干部学习,克服自满自利,骄傲自满的指示
3. 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 ----- (8)
4. 对卫生工作的讲话 ----- (19)
5. 在中央政法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 (10)
6. 在中央文革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 ----- (11)
7. 在中央文革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 ----- (11)
8. 给林彪同志的指示(一九六七) ----- (12)
9. 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四条重要指示 ----- (12)
10. 对十指局夺权的指示(一九六七) ----- (12)
11. 给韩爱晶同志的指示(一九六七) ----- (13)
12.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 ----- (13)
13. 对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一九六七) ----- (13)
14. 在周恩来总理谈夺权问题 ----- (14)
15.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 (15)
16. 论十大关系 ----- (19)
17.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29)

毛主席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一日于杭州)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妄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份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憎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那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赋”的政策，“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泡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廿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二步学说话，三步哇哇哇地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也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

这个概念，已經去掉了許多東西，男人女人不見了，大人小人不見了，中國人外國人不見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誰也看不見，只能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麼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系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戚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寫得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好處是點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

高中畢業後，就要先做點實際工作，單下農村還不行，還要下工廠、下商店、下連隊。這樣搞他幾年，教師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學、文學、歷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樓里教嗎？

大發明家瓦特、愛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個發明電的富蘭克林是個棄報的報童出身。從來的大學問家、大科學家很多都不是大學出來的。我們黨中央裏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

寫書不能象現在這樣寫法，比如講分析綜合，過去的书都沒有講清楚。說“分析中較有綜合”，“分析和綜合是不可分的”，這種說法恐怕是對的，但有缺點。應當說分析和綜合，就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麼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為二。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況，比如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分析。我們過去是怎樣分析國民黨的？我們說，它統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軍隊多，武器強。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們脫離群眾，脫離農民，脫離士兵。他們內部有矛盾。我們是軍隊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槍）土地少，沒有大城市，沒有外援，但是我們聯繫群眾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風，代表群眾的要求，這是最根本的。

國民黨的軍官、陸軍大學畢業的，都不能打仗，黃浦軍校只學幾個月，出來就能打仗。我們的元帥、將軍，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我本來也沒讀過軍事書，讀過“左傳”、“資治通鑑”，還有“三國演義”。這些書上都講過打仗，但是打起仗來，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書也不帶，只是分析，敵我鬥爭形勢，分析具體情況。

綜合就是吃掉敵人。我們是怎樣綜合國民黨的？還不是把敵人的東西拿來改造。俘虜的士兵，不杀掉，一部份放走，大部份補充我軍。武器糧食，各種器材，統統拿來，不要的，用哲學的話說，就是揚棄，就是杜聿明這些人，吃飯也是綜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腸吸收營養，把渣滓排洩出去，你們都是洋哲學，我是土哲學。對國民黨的綜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份吸收，小部分揚棄。這是從馬克思那裏學來的。馬克思把黑格爾哲學的外壳去掉，吸收他們有價值的內核，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對費爾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義，批判他的形而上學。繼承還是繼承的。馬克思對德國的空想主義，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好的吸收，壞的拋掉。

馬克思的資本論，從分析商品的二重性開始，我們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後

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錯誤。你們沒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講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楊献珍、張開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們。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那一个阶级沒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譯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說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語言来写，我們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話：主席除外）我做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国民党运动，作过廿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做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統一嗎？近代史就是不断的一分为二，不断的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凱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較好办，哲学的麻煩，不大好搞。辯証法过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質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質、內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說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講思維形式的，講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罵我們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們說“国民党是匪徒，蔣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說蔣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当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証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 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摘录）

1963.12.13.

“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列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即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成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学习，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地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造，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道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喜欢看好的，不讓看坏的，只向他们说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和错误。要谈也谈不深刻，敷衍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的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做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很多人却很少认真地运用这个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形而上学的方法，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变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使人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倾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满招损，谦受益”这句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人民利益考虑是一个真理。

1. 骄傲自满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产生和滋长。但是一般说，还常在胜利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这是因为当处在困难情况的时候，一般容易看到自己的弱点，也是比较谨慎的，而且客观的困难压在面前，不虚心谨慎也不行，可是每当胜利的时候，由于有人感谢，甚至过去的敌人也会掉过脸，奉承一番。因而就容易为胜利后的顺利环境冲昏头脑，而全身轻飘飘起来，真以为“天下从此定矣”我们深深的懂得越是在胜利的时候，骄傲自满的细菌就越容易袭击党。

2. 产生骄傲自满情绪，一类是胜利情况下产生的，那就是胜利冲昏头脑，自以为不起了。另一类是在即无特殊胜利亦无特殊失败的平常情况下产生的，他们经常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廿年媳妇熬成婆”等等来自我陶醉。

再一类是落后情况下产生的，即虽然落后了××也还是骄傲，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虽然未做得很好，比过去总是好些了！”“某某同志或某某单位××还不如我们啦！”他们每当回顾过去历史，开口三句话不到，就是想当年请起龙眉飞色舞。

3. 只要我们稍微忽视一些群众的力量，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的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我们就会骄傲起来，只要我们稍微把成绩估计的高一些，我们就

会驕傲起来。

4. 驕傲自滿的情緒從本質上說，乃是从个人主义的立場上引伸出来的，同时他又培养和滋长个人主义，而驕傲自滿的本質就是个人主义。

5. 就階級根源来分析，驕傲自滿基本上是剝削階級思想，其次才是小生产者的思想。

6. 小生产者就其本身是劳动者而言，他們是具有許多优点的。他們勤劳朴素、刻苦、謹慎和实事求是。但是其本身是小私有者而言，則他們是个人主义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們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方式是落后的生产工具，分散經營，眼界不广，見聞不多。因此他們往往不能看集体的力量，而只看到个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們也很容易滿足。當他們取得一些微小的成就以后，就往往会产生“这个不錯了”、“这已到頂了”、“該享享福了”以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等等这一类思想。

7. 驕傲自滿是在資產階級唯心主义世界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它会使人們××，看待周围客观事物的态度經常违背事物发展的規律，把人們引向失敗的道路。唯物主义历史观証明：社会发展历史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历史，而是劳动人民群眾的历史。可是，驕傲自滿的人总是夸大了个人的作用，居功、驕傲，而忽視或低估了群众的力量。

8. 因此驕傲自滿情緒在本質上是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我們党的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觀。

9. 驕傲自滿的人往往不能忘怀于自己的許多优点，一方面把自己的許多缺点掩盖起来，另一方面把別人的許多优点抹煞掉，他們經常拿別人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相比，从而私人窃喜，看到人家的优点則認為“没有什么了不起”，“算不上啥”。

10. 事实上把自己估計得越高，所得到的結果就越坏。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就幽默地說过：“一个人就好象一个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象分子，而他自己的估計好比分母，分母越大則分数的值越小。”

11. 謙虛，它是每一个革命工作者都应具有的美德。因为謙虛对人民的事业有利，而驕傲自滿却会把人民事业引向失敗。所以謙虛也是对人民事业負責的表现。

12. 一个人要真正称得上一个名符其实的革命工作者，必須做到下列两点：

首先，他們必須尊重群众的創造，肯听群众的意見，把自己看成群众的一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毫不誇大自己的作用，实心实意地为群众工作。这种精神就是魯迅所說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也就是謙虛的美德。

13. 其次是，他必須有不屈不挠永远前进的精神，时时刻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于新鮮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和慎密的能力，因此他們就必须保持謙虛的态度，胜不驕，敗不馁，不貪天之功，也不滿足于自己的成就。这种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高貴的謙虛美德。

14. 一个人如果能够認真从工作中，生活中和其他实际斗争中去学习，經常总结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努力寻觅自己不够的地方及自己的缺点与錯誤，无情而堅決地和驕傲自滿的情緒作斗争，并毫无保留的加以彻底的克服，那他是完全可以鍛炼成为一个具有謙虛品德的人。

15. 真正具有謙虛高貴品德的人，也必須是满腔热情地无条件地为党、为人民、为革

作事业而忠诚如一、积极工作的人。他之所以工作，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也不是为了获得某些奖励和荣誉，不夹杂任何自私自利的欲望和要求在内，而是全心全意地为着给人民带来愉快和利益。因此他总是埋头苦干地做着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工作，从不想抛头露角，从不计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待遇。他不仅不在别人面前誇耀自己的功勋和成就，而且在自己内心中不讓这些功勋和成就占地位，他全付精力所考虑的只是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16. 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为什么必须要求自己具有谦虚的美德呢？

第一，因为他懂得他一切知识和成就的获得，虽然自己尽了一定的力量，但重要的是群众的努力。没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他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不可能获得工作上的成就。作一个集体主义者，他就认为不应该抹煞群众的功绩，不应该“采他人之美，贪别人之功。”因而他觉得自高自大是可耻的。

第二，因为他懂得，他所学到的一些知识，所做的一些工作在整个知识的总宝库和整个革命工作当中，仅仅是“沧海之一粟”，是非常渺小的，而且革命的知识 and 革命工作又是不断发展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要用他宝贵的生命最大限度地获得对人民有用的知识，最大限度地对革命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固步自封，替自己关起进步的大门。

第三，因为他懂得整个工作象架大机器，是由大大小小的各式转盘、螺絲、钢架和其他机件紧密結合而构成的。誰也少不了誰。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他便觉得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个人的成就，就象他尊重自己的工作和成就一样。为了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和别人的工作紧密配合，他感到离不开集体，他热爱自己的伙伴，因此他必然会用谦虚的态度来待人接吻，而不会对任何人狂妄自大。

第四，因为他懂得一个人的眼界往往是狭小的，能够看到的范围总是有限的，而革命知识和革命工作的范围都是极为广阔的，并且内容又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因此他便进一步懂得，每一个人总免不了会有若干缺点，会犯若干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又常常不是自己全部及时察觉到的。他既然是一个集体主义者，为了要把革命工作搞好，为了对人民负责，他就热情地要求自己看得更深更广，要求能及时发觉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迅速地改正。因此，他便要虚心、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和請教，他便要誠懇地欢迎别人对他的批評。

由此可見，真正从集体主义出发的人，是必然具有谦虚精神的，是进取精神和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的反映。

17. 克服骄傲自满和培养谦虚品质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努力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这就必须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为什么？

18. 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可以帮助我們科学地認識世界，認識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組織、个人与党的相互关系。

正确地認識人民群众和个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創造者和革命斗争中的基本力量。我們要在中國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領導下的亿万劳动人民的創造力量。至于个人，在

革命事业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而已。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是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作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深刻地理解了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互相关系，我们便会自觉地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窄的范围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自己的脚下，看不到高山大洋的时候，他是会象“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把头抬了起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化无穷，人类事业之雄伟、浩壮、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极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我们不仅要看到自己的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要看到整个的、长远的、全面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克服那种因小小成就、小小胜利而自满自足的小生产者的思想，而促起我们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的渴望，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唯心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

19. 谦虚和自卑并不是同义词，谦虚并不等于小视自己，因为谦虚本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正视客观现实的进步精神的表现，而自卑却是一种非实事求是的，缺乏自信，对困难取畏缩的表现。

自卑和自夸、自高自大同样都是错误的，都是以主观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是对自己的两种极端主观主义的错误估计。那些自高自大的人，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高，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和作用，因而他总是自命不凡，自以为了不起，他就不再前进了，他也就不会去吸收什么新鲜事物了，他于是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那些自卑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和自高自大相反，但同样也是离开了客观实际，把自己估计得过低，忘记了自己还可以努力提高自己的，还可以从工作中锻炼自己，过分地降低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所已经起的和可能起的作用，于是便从而丧失了前进的勇气和信心，松懈了斗争的意志。

总之，无论自高自大和自卑，同样都是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都是非实事求是的，非科学的态度，因而都是错误的，都会使革命事业遭到损失。所以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一类的习性，而且要严格地把谦虚与自卑的界限分开，免得由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完）

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需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葛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少斗头？葛伯赞出那样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这一联，讲他“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要牵到你的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县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不出，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乱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也没有，搞一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你去就是叫包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主席讲：没有人死吧？）左派挨打，是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出来，我可以去替他们，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那个书上有：那个将军赶快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葛伯赞可被右派用，也可以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

是民愤极大。代委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党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可搞个收发。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以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

有些人没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同事，同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吗？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现成的，有的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贴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65年6月)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工作，而且这百分之五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初中生，初中三年毕业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是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的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人力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放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咳！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咳！

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邓小平耳朵痒，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聶荣臻说：这个人很蠢。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的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总理说：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聶元梓现在怎么样？（康生说：还是要保。李先念说：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谈到大串连问题时，总理说：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在中央文革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毛主席说：“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

毛主席还说：“陶铸的这个问题，我没解决得了，你们也没解决得了，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央文革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来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

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指伯达同志）我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了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我们要同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通通搞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工作岗位，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青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

过。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竟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给林彪同志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

毛主席看了安徽××文件给林彪同志的批示：

应该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革命，以后凡是真正的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作。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拟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

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四点重要指示

(一九六七年)

1. 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 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曾做戴高帽子，抹黑脸的，脱帽洗洗脸，立即上班去工作。
3. 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 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的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对广播局夺权的指示

(王力同志传达)

广播局的同志夺权了，把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很好。听说内部有分裂，应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给林彪同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又及：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周总理传达)

1.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如材料运到部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须支持左派。

2. 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这时毛主席引用《战国策》上的，“触警说赵太后”）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上，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3. 关于夺权，报纸上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仔细分……，应该夺了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4. 夺权前的老干部和夺权后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对人民解放军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叶剑英副主席传达)

一、我认为×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前有后。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热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部队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昆明军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和周恩来总理谈夺权问题

(一九六七年)

毛主席问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一天多。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1）是黑帮，影响很深，变黑帮。（2）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3）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承认错误，还有错误。（5）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1）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2）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3）停职留用。（4）撤职留用。（5）撤职查办。

总理：哪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窟窿。要巩固住，主要看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过去很快又会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的，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

六月一日下午，毛主席通知说：“北大的这张大字报，是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必须立刻广播，立即见报。”下午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八点半就广播了，二号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广播后在全国大学和一部分中学里，都动起来了，他们一方面声援北大，一方面在本校发动革命。毛主席是从群众中来，然后到群众中去，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

康生同志九月八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外地来京革命串连同志时的讲话

毛主席经常引用“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句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经常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里讲的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共中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

你们学校内“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按：北大同学不满北大工作组的错误路线，出于革命义愤，在六·一四自发地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牛鬼蛇神斗了一通，其中发生了打人现象，后称“六·一八”事件——编者）张承先说是反革命事件。那时主席不在北京，在武汉。毛主席看了有关的全部材料，他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六·一八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的事件”这样两句话，把条子寄到北京来。同学们，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革命行为的。

江青同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向你们学习，这不是谦逊，因为毛主席说过了：一个革命的正确领导，都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当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

康生同志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一九六六年七月

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说：“学游泳有个规律，找到了规律就容易学会。”革命也有规律，掌握了它的规律，才能有驾驭整个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能力。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泽东同志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说，不论质量互变也好，否定之否定也好，都是对立统一，不论怎么说都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只能一元化，不能多元化。自然界、社会充满了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出现，没有没有矛盾的世界，也没有没有矛盾的社会。有时具体的矛盾我们可能指不出来，但矛盾永远存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永远如此。

陈伯达同志七月三十日在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全国的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周总理八月二十二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靠谁来搞？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讲得非常彻底。毛主席说，靠工作组是不行的，工作组是海、空军机关的、国家机关的，他们一不教书，二不当学生，他们怎么会了解学校的情况？北大有个高德贵，他写了很多书和文章，你们都全看了吗？你没看，怎么批判呢？学校的文化大革命靠工作组不行，靠你们（指参加中央全会的同志——编者）、靠我也不行，就得靠学校的革命师生自己。

四川省委书记八月二十六日在四川大学的讲话

我告诉你们，毛主席最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清朝政府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洋军阀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蒋介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北京大学陆平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过学生运动，有好下场吗？后来派出的工作组又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又没有好下场。当然，我们应当讲，主要还是派工作组的人的责任。

湖南省委书记九月二日在湖南省级机关干部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在“十六条”中写了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八个字是毛主席亲自写上的，原来的稿子没有这八个字。……如“不准打人”的话，是从“二十三条”

上抄的一股。后来主席抹掉了，亲自写上了这八个字：“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八月三十一日接见长沙高等学校

教师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过去我也搞过不少这种事，我也打过人，给地主土豪戴高帽。毛主席说：这样不好，农民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做。

陈毅同志八月三十日在外语学院的讲话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顾实行。”

陈伯达同志《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毛主席说，青年人看问题可以这样看看，也可以那样看看。一些志同道合的结合在一起，不做过头小事。所以你们青少年的精神，我们是称赞的，你们是蓬勃的，你们有首创精神，你们创造了好多革命组织，首先是红卫兵组织。毛主席称赞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清华附中的“三湾”形成了全国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

周总理九月二十六日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

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讲话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日下午七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庆祝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革命群众。毛主席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给北京大学新校刊题字“新北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小将，首次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时，高兴地对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游行的队伍，像奔腾的长江，浩浩荡荡，走过毛主席面前，走过天安门广场。千万人抬头仰望，千万人沐浴着幸福的目光，千万颗红心向太阳，千万人欢呼歌唱。

亿万颗充满热情的革命群众，毛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在一起》，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大家希望毛主席能写新的《中国妇女》杂志题词，劳苦同志八月十八日向毛主席传达了这个请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最关怀、最支持劳动群众，过了两天，就用他那写出大量光辉著作的笔，写了“中国妇女”四个大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说：全国各地都可以来北京，北京也可以去全国。……让外地的都来看看，现在坐火车不是免费了吗？

××同志八月二十一日接见西安交大、重大、

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志们必须认真理解，不然就会象毛主席批评过的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叶剑英同志十月五日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允许青年犯错误，只要他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的小缺点允许犯嘛！我相信他们自己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谢富治同志九月十三日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的讲话

对于过去的教育制度，毛主席说，使你们越学越蠢了。现在正是你们转化的关键时刻，要好好学习。

周总理九月十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红卫兵

毛主席讲了，革命要靠本单位，资产阶级当权派和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自己（指本单位——编者）最清楚，外单位可以煽风点火。

周总理九月七日在社科院辩论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说，革命内因为主，外因为辅。

周总理九月七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北京

市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

《论新阶段》，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地对参加接见的一些负责同志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主席第七次接见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九

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志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中 央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七日

论十大关系 1956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工业、农业、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是为了新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论是革命中间，或者建设中间，同样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有些问题还是值得谈，其中有些新东西。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有不够的地方。谈一谈，考虑这些问题，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可以少走些弯路。

我把十个问题念一念：

第一个问题：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第四个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第五个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第六个问题：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第七个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

第八个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第九个问题：是非关系；

第十个问题：中国和外国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一些矛盾，世界到处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现在我就来谈上面提的十个矛盾。

第一，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重点要优先发展，大家没有异议。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我们并没有犯过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没有犯过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错误，他们片面地看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生活品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都是比较注重的。我们市场上的货物比较充足，同有的国家在革命以后的市场情况不同，我们的生活品说十分多也不那么多，但是我们有了相当丰富的民生日用品，并且价格是稳定的，人民币是稳定的。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问题了。也还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重工业，对于农业，比过去要更加注意，就是要适当地调整一下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要在工农业总投资中适当地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重。

这样，是不是重工业就不是为主了呢？还是为主？是不是对重工业不注重了呢？现在这样提，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

今后需要在轻工业和农业方面多投一点资，使这方面的比重加重一些。

是不是要改变重点？重点没有变，重工业还是重点，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方面更加重一些。

加重的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就是会更多更好地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发展重工业，需要有资金的积累，积累从哪里来？重工业可以积累，轻工业和农业也可以积累。但是，轻工业和农业能积累的更多些，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你究竟想发展重工业还是不想？或者想得不厉害，还是想得差一些点，你如果是不想，那就打重工业，打重农业；你如果想得差一点，也可以对轻工业少投一些资，对农业少投一些资；你如果不想厉害，那你就注意发展重工业，就要注意发展农业，使得生活品更多些，积累就会更多些，几年之后，转到重工业的积累也会更多些。所以这是一个真想假想的问题。

当然对于发展重工业，真想、假想，在我们这里来既都不适当，谁都不想，就是想得不厉害不厉害。你真正想得重工业想得厉害，你对轻工业就应当多投一些资，不然你不想的就不十分真，只有九分真，那就不厉害，那就是你对重工业不十分注意。你如果十分注意，你就要注意发展轻工业，因为，第一是它能满足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它能更多更快地提供积累。

在农业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改变集体化了，搞得不好也还是不能增产，有的国家的农业，不能增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有问题，在税收上使农民的负担很重，在价格上农产品很便宜，工业品很贵。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把农业摆到一定的位置上，实行正确的农业税收政策和正确的工农业产品价格政策。

第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照顾沿海。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有根本的、大的错误，但有一些缺点，最近几年，对于沿海

工业，有一点不那么十分注重了，恐怕要改变一下。

原有工业、无论是重工业、轻工业，多少在沿海？

所谓沿海，就是辽宁、河北、北京、河南的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沿海地方，重工业的百分之七十也在这些沿海地方，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个事实，对沿海工业估计不足，如果还不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生产力，那就很不对了。

我们应当尽量利用可能的时间，使沿海工业有所发展。我不是讲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应当建在内地，但是沿海也可以建一些，比如，鞍钢、抚顺就在沿海；比如大连有造船业；唐山有钢铁业；有建筑材料工业；塘沽有化学工业；天津有钢铁工业；有机器工业；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地方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

今后大部分的重工业，百分之九十或者还要多一点的重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全国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起来，使全国工业有个合理的布局，这毫无疑问。但是，部分重工业还要在沿海新建和扩建。

过去的工业的老底子主要在沿海，我们如果不注重沿海工业就要吃亏。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能力，好好地发展沿海的工业，可以使我們更有力气来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是不对的，这种消极态度不但妨碍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妨碍内地工业和迅速发展。

我们都想发展内地的工业，问题在于你是真想还是假想。如果是真想，而不是假想，就必须多利用沿海的工业，多搞一些沿海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从现在材料看来，有些轻工业工厂建设很快，投入生产并全部发挥生产能力以后，一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这样，五年以内，除本厂以外，就可以增加三四个厂。有的五年可以增加两、三个，有的可以增加一个，至少可以增加半个。这同样说明利用沿海工业的重要。

我们的远景计划缺少四十万名技术干部，可以从沿海的工人和技术干部人员中培养出来。技术干部不一定要科班出身。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鲁迅大学没有毕业，在旧社会，他只能当讲师，不能当教授。肖楚女同志更没有上过学校。应当相信，技术工人，他们在实习中学习，可以成为很好的技术干部。

沿海工业，技术高，产品质量好，成本低，新产品出的多。它的发展，对全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有带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总之，不发展轻工业就不能发展重工业，不利用沿海工业就不能建设内地工业。对沿海工业不能只是维持，而是要适当地发展。

第三，经济建设 and 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把兵营院都撤掉了好不好呢？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敌人在“整”我们，我们还受敌人包围。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国防力量，在抗美援朝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军队更强大了，自己的国防工业正在建设建立起来。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懂得制造汽车，不懂得制造飞机，现在，我们开始能制造汽车了，也开始能制造飞机了。我们的汽

重工业先搞军事，不搞城市；所以我们每天只好坐共同的車子来开会，想要爱国，受不
那么快，哪一天我們开会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車那就好了。

二 我們現在还没有原子彈，但是，过去我們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們是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和蒋介石的，我們已經相当强，以后还要更加强，可靠的办法就是
把軍政費用摆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使軍政費用支出的比重，分几个步骤，降到國家于
算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增加經济建設費用，使經济建設有更大和更快的发展。在这个基
础上，国防建設也就能得到更大的进步。这样，在一个不长的時間內，我們就不但會
有很多飞机，很多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彈。

三 你真想要原子彈嗎？你就要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要多搞經济建設；你假想要原
子彈，你就不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就少搞經济建設。究竟怎样才好？請大家研究一
下。这是战略方針問題。

在一九五〇年，我們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經提出精减国家机关减少軍政費用
的問題，并且，認為这是争取我国財政經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但是，第一
个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占國家于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即有三分之一的支出
用于不生产方面，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計劃应当想办法把这个比重降下来，以
便抽出更多的資金，投入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

四、國家、生产單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最近我們跟各省的同志談，他們对这个問題談的比較多。請王天斌工人的劳动生产
率提高了，每个工作日的产值增加了，工資也需要适应提高。不注意这点是不妥的。

解放以来，工人的生活有很大改善，这是大家知道的，有些过去家里根本没有职业
的，现在有人就业了。有些只有一个職位的，现在有两个或三个職位了。我就說詳
过这样的家庭，过去他們没有职业的，后来夫妇两人还有一个女儿，都有了职业，合起
来生活当然就不錯了。我們的工資一般說，越不弄高，因为就业的人多，工資就低而
穩，生活安定，工人的生活水平同解放以前是没法不可比較的。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一直是
高的。

关键在面請的，是要注意发挥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厂整个生产單位，也有一个主
动性和积极性的問題。

二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統一性和差別性。不能光有統一性，沒有独立
性，沒有差別性。比如，現在开会是統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做步，有的
人去吃饭，客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地开
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單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
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統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

給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給生产單位以一定的主动性，这对整个國家工业化好
不好，应当是更好一些，如果更差一些，那当然不要。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起来，把
工厂的折旧費也都统统拿走，使得生产單位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不利的。在这个問
題上，我們的經驗不多，在座的同志們的經驗恐怕也不多，我們在研究，那么多工厂，將
来还要多，使得他們的积极性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来，这对我們的工业化一定会有很大的
好处。

講到农民，我們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問題上也曾犯过一个錯誤，一九五四年全国因水灾减产，我們多購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購一多，农民就有意見了。不能認為我們一点缺点也沒有。沒有經驗，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由于我們发现了这个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加上丰收，一增一減，使农民手里多了一百多到二百亿斤粮食，所有过去对我们有意見的农民都沒有意見了，都說“共产党真是好”。这个教訓全党必須記住。

农民集体經濟組織同工厂一样，也是生产单位。在集体經濟組織里面，集体同个人的关系必須搞好，必須处理得恰当。搞得不好，不注意农民的福利，集体經濟就不會办好。在这个問題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是犯了錯誤。在那里集体經濟組織，有些大概办得好，有些并不是办得那么好。办得不好的，农业生产就不那么发展。集体要积累，但必須注意，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除了碰到不可抗拒的灾害以外，必須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我們跟各省的同志談了夏收、秋收的分配問題，所謂分配問題就是：（一）国家拿多少？（二）集体拿多少？（三）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的问题，国家是我，集体是积累，和经营管理费，个人就是分粮食分钱。

集体經濟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說了，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对生产费，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这几項，我們应当同农民在一起，研究出一个适当的比例。

国家要有积累，集体也要有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国家的积累，我們主要是通过稅收而不是經济价格。工农业品的交换，在我們这里，是采取縮小劳力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工业品是采取薄利多销的政策和物价稳定的政策。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集体經濟組織，国家和农民，集体經濟組織和农民，都必须照顾，都不能只顧一头。这一条有一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問題，是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問題，必須引起全党的重視。

第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更多地發揮地方的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計劃下，讓地方办更多的事。

现在看起来，恐怕要求还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地方的权利过小，对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利的。我們的宪法上規定地方沒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只要不违背中央的政策，在法律規定的范围内，而情况需要，工作需要，地方也可以定些章程，定些条例。在这方面，宪法并没有約束。

重工业要发展，轻工业也要发展，必须要有市場和原料，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發揮地方的积极性。要巩固中央的领导，就必須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各部天天給省市的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是都說是中央來的，給地方压力很大。表徑之多，鬧得泛滥成灾，这些，都应当改变，都要商量出調整的办法。

中央的地方部可以分为两类。有一类，他們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們設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在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們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訂工

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做主。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自下命令。在这方面，我们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在商量好了以后再下命令。

我们要统一，也要有特殊，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必须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而是为了正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省市对中央各部门有不少意见，要提出来。地、县、区、乡对省市也会有不少意见，省市也要注意听，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正当的积极性、正当的独立性应当有，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中央对省市、省市对地、县、区、乡，都不能够也不应当框的太死。

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不要乱来，必须谨慎，可以统一的，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统一的，不应当统一的，不要强求统一。

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是从地方主义出发，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要为国家利益争“地”，闹其可闹者。

中央准许的独立性，是正当的独立性，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总之，地方要有适当的权利，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有利。把地方的权利搞得很小，恐怕是不那么有利。国家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也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大家好好研究讨论。

第六，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的政策是稳定的，得到少数民族的赞成。我们尊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是有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反对大汉族主义，按人口，汉人占大多数，如果汉族搞大汉族主义、排挤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所以，要在汉族中间广泛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教育。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要求一次检查。早两年有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检查，如果有关系不正常的，应当加以纠正，不要只口里讲。现在有许多人讲不要大汉族主义，口里讲得很好，实际上没有作。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制度，财政制度，究竟怎么样才适合，也要好好研究一下。

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汉民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下宝藏不少，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汉民族必须积极帮助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过民族关系的改善，把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统统调动起来。

第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这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这一条不是什么新的，但是因为说到这里，应当把这个关系说一說。究竟是一个党好，有几个党好？现在看来还是有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一直到一切党派都自然消失了的时候为止。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好处。

党派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没有什么不是历史上产生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也要在历史上消失，共产党是历史上产生的，因此，

它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是这个命运。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将来都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非有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不要机构庞大。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話又說回来了，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說不要民主党派。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对这些人，我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要把他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现在中国表面上没有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实际上，这些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就是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对外政策一边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镇压反革命，他们也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部举手赞成。事情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一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要变面，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改善。我们要请民主党派人士说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很有理。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同志，抓一下统战工作，省委书记要抽出一定时间检查一下，部署一下，把这个工作推动起来。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呢？它是消极因素，它是破坏因素，它不是积极因素，它是积极因素的反面。消极因素可以不可以转变为积极因素？破坏因素可以不可以转为有利因素？反革命分子可以不可以转变？这要看什么社会条件，死顽固、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必然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下，就他们大多数来说，将来有一天是会转变的。当然，有些，或许没有来得及转变，阎王就请去了；有些人能够转变，他们那一年会转变？

由于人民力量的强大，由于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态度、政策，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变成不反革命了，他们参加了农业的劳动，参加了工业的劳动，有些人还很积极，作了有益的工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有几点是应当肯定的。比如说，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不是应该的？似乎有这么一种意见：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要。这么看是不对的。应该承认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就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各种不同处理，是应当的。这些办法，都需要给老百姓讲清楚。

杀了哪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一批东霸天西霸天，对他们那班人，老百姓不赞成。肯定过去杀这批人杀

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不肯定这一点说不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应当肯定的，在社会上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已大为减少。我们的社会秩序很不错，也还不能放松警惕，说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了，高枕无忧，那就不对。有少数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破坏活动。例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

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提少杀，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把他们交给农业合作社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不宣布一个不杀，还不能废除死刑。假定有一个革命分子杀了人，或者炸了工厂，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第三点应当肯定的，在机关、学校、部队里面进行镇反工作。我们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些人不杀，不是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掉了没有什么好处，不杀掉却有好处。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就让他去劳动改造，把废物变有用之物。再说人的脑袋不象韭菜一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机关镇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防碍我们对反革命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错误，可以保证犯了错误还能够改正错误，可以稳定很多人，不杀头，既要给饭吃。所以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奔头。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做长期的艰苦工作，大家不要松懈。

第九，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容许人革命。人家犯了错误，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

《阿Q正传》是一篇好文章，我劝看这篇文章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看一看。鲁迅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而不觉悟的农民，写他最怕人家批评，一批评就和人家打架。他头皮上长了几个痼疮疤，自己不願说，也怕人家说，愈是这样，人家说得更厉害，结果闹得很被动。鲁迅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

过去，我们党内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那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对不合他们胃口的人，他们总是随便给人家安上犯过什么错误的罪名，不许人家革命，打击了很多人，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如果我们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那是不好的，已经进了党了，人家犯了错误，不准他改正错误，也是不好的。

我们应当容许人家革命。有人说，对犯了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要向他们作些工作，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对犯错误的人，应当一是“看”，二是“行”。对犯错误的人要给工作，要给帮助，不要幸灾乐祸；不给帮助，不给工作，是宗派主义的作法。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其中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犯不改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谨慎了，可以少犯错误。我们希望所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免疫力。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危险，更要警惕，因为没有这种免疫力，容易忘己。我们

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会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结果跌倒了爬不起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的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我们

是非要搞清楚，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斗争，党内有此际要有斗争，这是必要的。按照情况，给以恰当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这个口号我是提得对的。有一种国家领导人不敢提这个口号，也不愿提。要有一点勇气，就是要把戏台上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一切民族的长处，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不然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承认每个民族都有长处，不是承认没有缺点。没有短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这两点都会有。我们的支部书记，军队连长，排长，他们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开会不为别的，总结总结有两点，一个是短处，一个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只提优点，没有缺点？那有这个事，一万年都有两点，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两点。总而言之，不是两点而不提缺点。说只有一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提出学习外国的长处，当然不是学习他们的短处。过去我们这里有些人闹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落在一个筋头。这象孙悟空那样，翻过来了。学人家的长处，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落在一个筋头。

过去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天又刮北风，他又成了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随风主义，往往由这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不要这样，不要盲目地学，要有分析，要有批判地学。不可以搞成一种偏向，对外的东西一概照抄，机械搬运。

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对这种教条主义我们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现在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还是有一些教条主义，应当继续作批判工作。

我们就是这样提问题的，学习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要能够独立思考。

我们公开的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的学习下去。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我们公开的承认本民族的缺点，别民族的优点。

我认为：我们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有两条优点。

第一、我们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帝国主义压迫，工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长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赶不上人家，赶不上人家，赶不上人家，但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有点过分，在外国人面前，仰不起头来。

腰，象法門寺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我國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來，要向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說之，”把抗美援朝中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我們的方針是，一切外國人的長處都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好東西都要學。

第二，我們的革命是後進的，雖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國早，但是那時沒有無產階級政黨，革命也失敗了。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蘇聯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幾年，在這點上也輪不到我們來驕傲了，當然，我們比起其他一些殖民地國家來說，革命先勝一步，也要防止驕傲。

前面這兩點是缺點，也是好處。我曾經說過，我們窮得很，又是知識不多。一為“窮”，一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算那麼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不高。窮則思變，才要革命，才要奮發圖強。一種白紙正好寫字。當然，我是就大概而言，我國勞動人民有豐富的智慧，而且有一批不錯的科學家，不是說都沒有知識。

一窮二白，使我們的尾巴翹不起來。即使將來工農業很大發展了，科學文化水平大為提高了，我們也還要把謙虛、謹慎的態度，保持下去，不要把尾巴翹起來，還是向人家學習。一萬年都學習嗎？這有什麼不好呢？

一共講了十點。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直接的因素，間接的因素，直接的積極因素，間接的積極因素，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勝利而奮鬥！

內部文件，不許丟失，只供學習，不許引用。

北京經濟學院，經濟系教工《向太陽》縱隊刻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北京經濟學院三〇三紅色翻印站翻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九日)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它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可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规划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作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作到，八年就更有可能普遍作到。

十三、力争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将其他地区的时期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功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基数为基数，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可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是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带起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的作法都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

問題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省和省、县和县之间，都可以組織互相參觀，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舉辦生产建設展覽會。

二十一、不斷革命。我們的革命是一個接一個的。從一九四九年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開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開始農業合作化，接着又是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即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進行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問題沒有完結，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每年都要用鳴放整改的方法繼續解決這一方面的問題。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中國經濟落后，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再過五年，就可以比較主動一些了。十年後將會更加主動一些。十五年後，糧食多了，鋼鐵多了，我們的主動就更多了。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之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減少驕傲情緒，想驕傲也沒有驕傲的時間。新任務壓來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務的問題上面去了。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還有人說要對老干部實行“贖買”，給點錢叫他們退休，因為老干部不懂科學，不懂技術，只會打仗，搞土改。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且完成這個歷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的技術革命。這個問題要在幹部會議中議一議，開個幹部大會，議一議我們還有什麼本領。過去我們有本領會打仗，會搞土改，現在僅僅有這些本領就不夠了，要學新本領，要真正懂得業務，懂得科學和技術，不然就不可能領導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曾經說過：“嚴重的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開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东西。”時間過去了八年。這八年中，革命一個接着一個，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問題上，很多人來不及學科學，學技術。從今年起，要在繼續完成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把黨的工作的着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全黨注意，各級黨委可以在黨內事先醞釀，向幹部講清楚，但是暫時不要在報上宣傳，到七月一日以後我們再大講特講，因為那時候基層整風已經差不多了，可以把黨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術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術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須注意把技術和政治結合起來。

二十二、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麼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术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精神、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步到邪路上去。

現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之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与否定的规律，永远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少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許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成蓝堡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人数二千四百人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次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派遣負責同志到地方的基層單位去，總結群眾中的這一類先進經驗，發展下層單位和群眾的這一類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創舉，建議主管機關給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規章制度中某些規定在這個單位實行，並且把這個單位的先進經驗推廣到其他單位試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還應當派遣負責同志到各地的基層單位去，發現那里有些什麼規章制度已經限制了群眾積極性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根據那里的實際情況，通過基層黨委和群眾的鳴放辯論，保存現有規章制度中的合理部份，修改或者廢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並且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在這個單位實行，也可以推廣到其他單位試行。

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應該系統地總結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進經驗。重大和全國性的，經過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地方性的，經過相應的地方黨委或政府批准。技術性的和專業性的，經過主管部門批准。然後在全國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單位中普遍推行。經過一段時間實行以後，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據新的經驗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種規章制度。

這是制定和修改各種規章制度的群眾路綫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風堅持到底。全黨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儘可能糾正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屬市、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員，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到下面去作調查研究，開會到處跑。應當採取走馬看花、下面看花兩種方法。那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知識，中央的有些會議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開，省委的有些會議可以到省會以外的地方去開。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幹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係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風。對於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听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

二十七、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綫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後加以考查，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要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驗。

二十八、在省、地、縣三級或者在省、地、縣、鄉四級的幹部會議上，討論一次黨的領導原則的問題。討論一下有些原則是否正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負責。”這幾句話里，關於黨委的責任，是說大事由它首先作出決定，並且在執行過程中加以檢查。“大權獨攬”是一句成語，習慣上往往指的是個人獨斷。我們借用這句話，指的是主要權力應當集中於中央和地方黨委的集體，用以反對分散主義。難道大權可以分散嗎？這八句歌訣，產生於一

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有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作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要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办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打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委书记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帅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常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常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和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之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情况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起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要纠正。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能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堆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誇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法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词章。看这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老师的事情，大少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委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会当地民族的語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文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付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切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份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份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份土地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有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份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配搭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造酒、造醋、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州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

辯論取得群众同意后，将这个經驗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計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作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問題。先在各級干部中間，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間，組織一次鳴放辯論，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見，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許多時間作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狀況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辯論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緒，不赞成这个建議，可以向他們說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担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請求，已經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許多同志的同意，認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請向干部和群众解釋清楚，免除誤会。

这次會議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漸和干部講明，不要采取傾盆大雨的形式。

这次所談的意見，都是建議性的。請同志們帶回去討論，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見。大約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